

生态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姚茂华 李红霞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吉首大学学术文库

吉首大学湖南省生态学重点学科(JSU0713)资助

湖南省教育厅一般项目(14C932)资助

生态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姚茂华 李红霞 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生态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 姚茂华, 李红霞著. —
成都: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643-3232-7

I. ①生… II. ①姚… ②李… III. ①乡村—生态环境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320.3②X17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2579 号

SHENGTAI XIANGCUN JIANSHE LILUN YU SHIJIAN

生态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

姚茂华 李红霞 著

责任编辑	罗爱林
封面设计	严春艳
出版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中铁二局永经堂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 × 210 mm
印 张	6.25
字 数	182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3232-7
定 价	26.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8-87600562

前 言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步入建设“两个尺度”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历史时期。

基于国家、市场与社会三种力量争相进入生态乡村建设领域的现实与趋势，以及对百年乡村建设的历史梳理与生态乡村建设的现实状况考察，本书认为需要对当下生态建设的系统性问题进行理论思考，需要在理论层面上对生态建设的实践与生成机制问题进行重新梳理。这样有助于推动乡村发展和中国的生态文明进程，有助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学转型进程。

导论介绍了生态文明建设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生态学转型的研究背景，本书的研究议题、研究方法和论述框架。本书直面“国家主导”“市场主导”和“社会主导”三种指引当前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取向，分析了三者的内在逻辑和现实指向，认为生态乡村建设过程中所呈现的种种问题，核心在于违背了整体性与可持续性的生态建设逻辑，以“碎片化”的视野来关照系统性问题，从而使生态建设的实践出现“问题式”。在梳理相关经典作家理论资源的基础上，本书试图提出一个理解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乡村建设的分析视角，即用国家、社会与市场协同治理来重构我们对于生态建设及生态乡村建设的理论视野。

第一章分析了生态建设中国、社会与市场协同治理的理论来源与发展过程。马克思和波兰尼都注意到了社会发展对于生态环境的冲击，而他们亦很有远见地指出解决生态困境的社会机制。从两者的理论构筑出发，都认为社会的长远发展必须高度重视生态建设问题，而其共同的关注点在于社会力量的构筑。马克思关注社会关

系的变革，认为生产关系的变动是造成自然环境与人类关系恶化的内在原因，而长远的发展也需寄托于生产关系的变革。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所推动的针对土地、劳动力与商品化的三波商品化浪潮最终导致自然环境的商品化，使自然环境丧失了其自身属性，最终将人类社会引入深渊，认为社会尤其需要保护自身抵御市场化的冲击，由此将自律性的市场重新纳入社会的羁绊之下。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是经典作家要解决生态困境所共同寄寓的主体，重构三者的关系是达成这一良好秩序的必由之路，“社会”的重建更是成为解决这一困境的重中之重。

第二章对生态乡村建设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结构进行理论分析。依据所建立的理论模型，本章结合中国乡村发展百年来的历史，分析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的发展主体和发展模式，认为中国乡村建设没有处理好三个结构性因素的关系，最终导致生态恶化。在三者协同治理的理论框架下，本章探讨生态乡村建设中特定的国家观、市场观与社会观，并结合实践考究国家、市场与社会在生态乡村建设中的结构性位置及其发育路径。结合生态乡村建设探索社会发展的可能性问题，认为在城乡统筹发展的背景下，乡村居民需要以主人翁的方式参与到当地社区生态建设中，生态乡村建设的过程同时也应是社区营造的过程。

第三章从组织、理念与效果三个方面考察了生态乡村建设过程中的社会建设问题，主要围绕社会因素对生态建设的制衡与反作用展开。考察发现，经济与社会、政治与社会之间体现出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相互的交织培育出相对独立的社会体系。案例揭示，经由社会对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渗入，当地发展过程中的社会要素得到充分彰显，相应的主体演变为社会型企业与社会理念主导的政府。进一步来看，生态产业的发展落实在乡村社会，塑造出了生态文化与新社区文化，而生态意识与相应的社会组织反过来又更好地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社区机制通过环境治理过程中的参与与监管，对人们生活方式的形塑，草根生态组织的培育，构建了

生态友好的治理机制。依托社会主导的企业，通过从利益分享机制到生态治理机制的跳跃，使发展的可持续性得到了保证。

第四章考察了生态型产业的形态、经营伦理与市场发展问题。田野考察刻画了具有生态伦理内涵的企业发展的历史效果，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所体现出的本土特点。在这一过程中涌现出一大批内化了社会伦理的企业经营者。生态型产业的市场拓展是其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生态型产业的内在要求。生态产业的发展历经了市场范围的突破、经营方式的变革、经营理念的提升，最终实现了从生态型企业向社会型企业的跳跃，而生态产业的市场也得到了保障。生态市场的濡化作用亦提升了农民在市场中的能力，产业链向农村社区延伸并扎根，提供了产业集群的坚实基础。生态型产业社会与经济双重兼顾的目标提供了发展的内在动力，塑造了独特的发展路径。

第五章考察地方政府在生态建设实践中的治理伦理、结构安排与发展策略。讨论揭示，作为地方执政理念的生态观是中央政府对生态议题的构建、地方政府的发展意图和当地自然人文因素三者共同塑造的结果。依托具体案例，本章指出了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生态建设的诸多措施，囊括了宏观性的经济发展的规划、中观的行业发展策略措施以及微观策略上的项目制管理方式。直面生态建设中中央-地方关系的经典议题，案例提供了新的解答方式，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协同治理的框架下，地方政府基于本土资源的特点，探索出了适合发展本地的执政方针，并发展出了稳定性的执政文化。这突破了以往研究中的中央地方控制与反控制的关系。

第六章考察了国家、市场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生态观在乡村社区中扎根的可能性。本章考察生态建设与乡村社区重构之间的复杂作用，微观的社区视角彰显了生态建设中国家、市场与社会之间的具体关系。生态建设提出了从绿色农业到绿色社区的可能性路径，包括绿色生活方式的重组、绿色建筑、绿色共同体、绿色文化等要素，经由日常生活安排、村庄规划、生产设施等方面的具体化。就

生态建设过程中所体现出的“人地关系”，本章指出了生态建设必须从具体的社区资源实际出发的观点。在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共同作用下，乡村经济社会重建的议题与生态乡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

第七章对全书的核心论点做出了简明扼要的总结和提炼。研究表明，生态乡村建设的萌芽、启动与最终扎根立足，需要从理论层次进行系统统筹，也涉及国家、市场与社会三个社会实践主体的多方面关系的重构与协同治理。从理论到具体实践，打通生态乡村建设中三者的关系，是写作本书努力想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在国家、社会与市场协同治理的体系下，既有的发展框架需要进行相应调整，而调整的结果必将带来深远影响。这包括发展理念的更新，发展主体、发展路径与发展伦理的重构，以及对于发展的新认识。本书最后指出，社会的培育是这一发展过程中的关键难题与核心环节，在现实条件下如何推进是进一步研究的新主题。

作 者

2014年6月

目 录

导 论	1
一、背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型	2
二、问题：生态乡村建设诸取向的反思	7
三、研究方法与田野简介	20
第一章 分析框架：生态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与市场关系	30
一、生态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与市场：理论来源	31
二、生态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与市场：理论发展	33
三、生态建设中的国家、社会与市场：结构分析	37
第二章 生态乡村建设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结构分析	49
一、乡村发展诸道路：从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看百年来乡村经济社会面貌	50
二、当前生态乡村建设中的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	58
三、生态发展：社区经济社会重建的分析模式	67
第三章 生态乡村建设中的社会发展：载体、理念与效果	72
一、一个生态乡村建设的崛起样本：宁国案例	72
二、作为社会载体的生态型企业：本土企业家群像	75
三、社会与企业：社区参与和新社区文化生成	79
第四章 生态型产业的企业形态、经营伦理与市场形成	98
一、“泥巴地里的公司”：生态友好型企业与社会型企业	98
二、二次创业：市场开拓中的社会型企业	106

三、生态产业市场浪潮下的小型资本发展空间	113
四、企业主导下的社会组织	120
第五章 生态建设与基层治理重塑：差异化政治及其过程	122
一、作为政治伦理的生态建设及其过程	122
二、生态建设的政府规制与引导：结构与策略	133
三、生态建设的策略机制：项目运行与本土回应	138
第六章 生态建设与乡村社区重建	147
一、乡村社区建设难题：生态如何切入	148
二、生态发展与社区建设的实践探索	150
三、生态发展与农村社区建设的再认识	163
第七章 总结、讨论与反思	166
一、基本结论	166
二、讨论与反思	172
参考文献	176
在校期间发表的论文、科研成果等	190
后 记	191

导 论

当今时代的突出特点在于，“全球问题”笼罩着整个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自觉地从反思和扬弃现代工业文明中，步入建设“两个尺度”相统一的生态文明的历史时期。^①

目前，中国的生态状况堪忧，具体表现为严重的环境、资源与气候三大问题。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耕地危机、矿藏资源乱采滥挖、能源损耗严重，遍及世界的温室效应、气候异常、现代疑难病症发病率居高不下、严重自然灾害频发等“全球问题”，正日甚一日地袭扰着我们。一系列数据和事实说明，在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期，解决生态问题，实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届全国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作为

①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曾说过：“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7页）马克思所说的“物种的尺度”和“任何一个种的尺度”实际上指客观事物本身的规律性，而“内在尺度”则在于人的主体性。人比其他动物高级，能够意识到这两个尺度，并在行动中自觉地把两者结合起来。

继“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之后提出的新的发展理念，生态文明^①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标和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而且在时代发展的背景下，还扩展到生态环境建设，使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将引领中国发展的新维度、新方向和新境界，这一提法和后续措施，将有望使中国发展进程中的环境恶化趋势有所遏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显现出新的希望。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理论，新的理论服务和创构新的时代。生态文明建设为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文价值关怀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研究提出了理论更新的时代课题，从理论形态和思维范式上全面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换，赋予马克思主义以强大的生命力和前瞻性的实践批判功能，是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崭新形态和重要历史使命。

美丽中国的重点、难点是乡村，落脚点也在乡村，没有生态乡村就没有美丽中国。本书就是试图以一种特定的方式——通过对生态乡村发展过程的考察和分析，为生态文明视域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做出有益尝试。

一、背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型，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和实践发展的需要，又是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之所在。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理论发展一直受到外在环境和内在选择两种因素综合作用的影响。从价值取向的角度来说，中国化

① 生态文明，指人类遵循人、自然、社会和谐发展这一客观规律而取得的物质与精神成果的总和；指以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良性循环、全面发展、持续繁荣为基本宗旨的文化伦理形态。（潘岳：《社会主义与生态文明》，载《中国环境报》，人民网，[http://env. people. com. cn/GB/6402210. html](http://env.people.com.cn/GB/6402210.html)）

马克思主义以中国最广大民众的切身利益与根本需求为出发点，在复杂的国际环境的背景下，结合中国的实际，致力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思维范式和理论形态的出现。历史证明，20 世纪初期至新中国成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便是中国式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并探索出了中国式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基本组织模式。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面临的迫切任务是及时调整视角，全面指导经济建设，把理论重心从革命转向生产、从农村转入城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形态便从打破一个旧世界转向建设一个新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在历史的发展中和挫折面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及时反思，进行认真的自我清理和自我反思，在不同的历史节点认真总结过去，面向世界确立新的起点，从而恢复了经济建设的中心，实行了改革开放政策，赋予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开放的”“实践批判的”意义。

当前，面对日益严峻的“全球问题”和中国的环境状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其高度的理论自觉、历史责任感和未来发展理念，深刻反思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社会异化”和“自然异化”的负面效应，兼顾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倡导节约利用资源，大力降低能源消耗，重新确立了环境治理和环境建设这一事关国家发展的基本工程，在实践中全面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赋予马克思主义以生态论特质，推动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生态学转型。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高度关注中国的环境状况和社会生活的环境质量，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同时承认先在自然和人化自然皆有其价值，认为“人化自然”与“先在自然”具有内在的统一关系。在坚持这一生态自然观的基础上，认为人类社会的存在与发展，依赖于先在自然与人化自然共同构成的客观物质基础，进而确立把治理建设一个好的生态环境视为“利在当代，功在千秋”的百年大计。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包括“人本身的自然（如人种等等）和人的周围的自然”“生活资料的自然富源与劳动资料的自然富源”

两大类。^① 马克思还揭示了人类社会与两类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彼此交会,他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那些尚未“复活”的广袤的先在自然,将会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价值选择活动的日益推进与不断拓展,逐步在社会领域“真正复活”起来。由此,我们也就明白,人与其他自然物的本质区别在于,人不是生态系统中一般的本能意义和消极意义上的消费者,而是生态系统的参与者、建设者、调控者、维护者。而在二元统一的视角下,自然界并不是绝对地外在于人和人的生活与活动的被动存在,而是和社会彼此互动、相互交融、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按照马克思的思想,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制于自然界、遵循自然法则,自然界作为“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客观要素,规定着人类活动的界限,具有一定的社会尺度和历史价值。同样,正如人们违背道德底线就要犯法,引起“人的异化”一样,超越自然底线就要违反自然法则,从而引起“自然的异化”。所谓“自然的异化是指人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呈现出负面价值”^③。也就是自然界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本身所产生的负价值,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

在坚持“两个尺度”相互统一原则的基础上倡行“以人为本”,在观照自然价值和人文价值彼此共存的发展目标下坚持可持续发展观,在扬弃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全面满足人的需要的过程中致力于改善环境、保护环境和环境生产,在指导、反思和推进社会实践、规划全面发展蓝图上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世界、和谐文化的宏伟目标,构成了生态学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征与目标。扬弃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是马克思生态学思想内

①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60页。

②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页。

③ 何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作为哲学形态何以可能》,载《哲学研究》2006年第1期。

在的要求；而关心人的环境需求，重视生态问题，发展环境生产，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是当下中国社会的必然去向，并已经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决策层面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引领中国社会进步的主流导向。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关系当今人类生存的热点问题上，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理论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不协调，集中表现在理论研究的滞后性。当前，随着社会的发展，一方面，实践和现实生活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的需求结构已经面临着新的危机；另一方面，理论研究领域却没有能够及时充分地反映它，研究它，关注它。理论发展没有把生态问题、人们的环境需要以及环境生产问题明确地予以必要的定位，在注重眼前利益、短期利益的视角下，在理论研究上没有意识到环境需要已经上升为当今人们特别重要、特别突出的生活需要。从而，人们也就对环境问题产生了“盲视”，没有意识到环境生产的重要性已经不亚于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环境生态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今天主要的生产生活方式。毫无疑问，理论与实践的脱节阻碍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功能的发挥。

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学转型，是一项重大的跨时代工程。在实践层面有待于继续深入完善和推进，在理论层面有待于开展思维范式、语境系统、价值取向诸方面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工作。

笔者生在农村，自开始学习社会科学以来，一直关心农村发展和生态建设问题，并就这一议题发表了一些文章。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转型的课题和农村普遍衰败的现实面前，笔者尝试着将生态文明的视野与农村发展相结合，探寻中国农村发展的新路子，追寻中国乡村建设的新希望。基于此，本书将研究中心放在生态建设与乡村社会转型上，围绕乡村社会生活的生态化与其实践道路，探索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生态化转型和乡村建设的新路径。

笔者和崔永和教授曾经就生态化道路下新农村建设中的关系问题发表过一系列论文，旨在提出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深层价值参照和理论依据。我们认为，当今中国新农村建设的道路选择，

需要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社会整体和谐为战略目标。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关系为主干，同时兼容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人与自己活动成果的全面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是扬弃和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新型文明形态，不仅是引领人类走出环境困扰的正确选择，也是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正确途径和理想目标。大量事实证明，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和谐；反过来，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否和谐，也必然影响和制约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否和谐。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应在尊重历史文化传统、创造生态文明形态的过程中，秉持“和而不同”的观念，辩证地看待差异问题，把扬弃消极差异、保留和发展积极差异结合起来，通过增强农民的主体自我意识，依托农村潜在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将发展生态经济作为手段，逐步提升农村文化的社会定位，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正如我们所指出的一样，中国新农村建设道路或模式的选择，适合采取不同于过去那种“一刀切”、抹杀一切差别的“差异趋同”模式。^①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们则提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道路，主要在于依托农村现实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发展生态经济、循环经济、无公害经济，在建设“和谐农村”的总体目标下，逐步实现农业的市场化、农民的市民化与农村的生态化。切实增强农民的主体能力和市场素质，全面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在继续加大外部社会力量对于新农村建设的支持力度的同时，破除中国传统社会城乡二元结构的等级分隔，消除一切对于农民的歧视性文化，全面构建中国的和谐社会。^②

尽管如此，新农村建设生态化路径的诸多重要关节仍需讨论，

① 崔永和、姚茂华：《差异趋同：生态哲学视域下的中国新农村建设模式》，载《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② 崔永和、姚茂华：《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载《中国新农村建设的生态化道路取向——再论中国新农村建设的模式选择》2007年第4期。

农村生态化建设的道路依然需要探索,理论面向实践的诸多转换机制尚待建立,理解当前农村生态建设的总体性框架尤其需建立。在社会实践面前,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需要不断反思自身的研究视角与研究议题,紧随社会改革的步伐,解决社会发展中的诸多焦虑,方能保持理论更新与学科活力,不辱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自创生伊始便以身担当民族发展重任的学科认定。

二、问题:生态乡村建设诸取向的反思

(一)研究议题

当前农村社会经济普遍陷入低迷状态,经济落后带来的直接影响可能是社会落后,表现为农村资源流出、城乡关系失衡、乡村治理困难等,最终将会对整个中国社会产生难以预期的后果。“三农”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国内学术研究的“显学”,吸引了社会各界的目光。新农村建设、中央对农业经济的关注与城乡一体化等各个层次的相关政策正是因乡村社会的瓦解而来,在这些外界对农村社会的干预渠道中,“生态乡村建设”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种。

中国语境中的生态乡村建设(亦有学者称“生态农村”或“农村生态”),早已突破了西方生态社区居住与规划的范畴,正在成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回应城乡落差问题的重要抓手。作为农村社区发展的新方向,生态乡村建设成为生态农业、新农村建设、环境保护与基层治理创新等实践的重要载体,形成了生态文明村、绿色社区、生态社区、生态村、低碳社区等侧重点不一但指向一致的实践方式。

从实践来看,“生态乡村建设”主要涉及乡村旅游业和农业产业化两方面。乡村旅游的发展有两个最重要的推力:一是城市化的发展以及现代都市的各种弊病使对乡村、对乡村旅游的需求不断膨胀,消费群体和城市居民的乡村消费行为不断增加;二是各级政府多将乡村旅游视为乡村振兴、乡村经济多元化的捷径。不过,各种力量结合的结果所导致的局面却令人大跌眼镜。一方面,到访乡村

的游客在乡村所获得的体验并不令人满意，乡村旅游或者品质低劣、或者单调重复，又或者刻意提升却成为城市体验的简单复制品；另一方面，乡村社区也没有从乡村旅游中得到太多利益，乡村社会的萧条依然无从止步。

无可置疑，通过这些努力，人们试图改变乡村面貌，而且也从某些方面切实改变了乡村的面貌。但是细推之下，这些努力不仅距离有效解决乡村社会的问题为时尚远，而且更为严峻的是，各种外界力量在进入乡村的过程中，与乡村社会原有的各种力量组合，产生了各种新的力量，这种新的力量极有可能导致乡村社会发生新的更难以处理的变化。换句话说，这种外界力量的干预，有可能激发乡村原有的矛盾，以致出现更多的问题。

如2011年爆发出的福建土楼居民与旅游开发企业之间的冲突。已经有400多年历史的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县承启楼，被称为客家“土楼之王”。近年来，永定县通过租赁土楼作为参观景点、征用土地用以建设配套设施等一系列措施，着力发展旅游业。然而，传统土楼生活与步步推进的旅游开发之间，已是矛盾毕现。2011年7月初，一场因乡政府治安人员清理摆摊小贩导致的冲突爆发，世代居住于承启楼的原住民关闭了土楼大门，拒绝游客进入，周边的土楼也相继关门谢客。据了解，拥有土楼产权的居民，过去的农耕生活来源已被斩断，在旅游开发中应该获得的利益又未受到保障，土楼屋外旅游红火，屋内生活穷困。^①另外，旅游开发的实践偏离当初的科学规划，土楼建筑的承受能力正在退化，如同原住居民一样，缺乏保护。申遗三年之后，这份世界文化遗产原有的人文面貌，正在利益侵蚀下迅速改变。^②

① 《福建土楼屋外旅游红火屋内生活困苦 不让建新房》，中国新闻网，<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1-12/2266570.html>。

② 屈运栩：《世界文化遗产三年惊变 部分客家土楼关门谢客》，载《新世纪》2011年8月，亦可见“新浪财经”<http://finance.sina.com.cn/roll/20110808/010810275414.shtml>。